

檢視中共政權

四十年的文化景況(上)

周玉山

一、前 言

文化與自然相對，原本泛指一切人爲的表現，是一種事實的概念 (concept of fact)。文化要發展到某一階段，才能稱爲文明，文明與野蠻相對，是一種價值的概念 (concept of value)。學術界對文化一詞最早的定義，來自英國人類學者泰勒 (Edward B. Taylor)，以文化爲一複合體，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和一切人類社會的能力與習慣^①。準此以觀，文化涵蓋精神與物質生活，尤以前者爲重。

共產黨人基於唯物史觀，認定人類在歷史實踐中，文化隨著物質資料生產方式的發展而豐富和積累起來，具有歷史的繼承性。至於社會主義文化，亦即無產階級文化，泛指社會主義的教育、科學、哲學、道德、文學、藝術等社會精神生活形式的總和，以及與之相應的設施。它是社會主義政治和經濟在意識形態上的反映，並對社會主義政治和經濟產生巨大的影響。中共現仍強調，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無產階級政黨領導，堅持社會主義道德，堅持人民民主專政，是社會主義文化發展的基本原則^②。由此可知，共產黨人的文化觀，不脫爲政治服務的舊調，且由於政治的強力主導，文化的附屬性和教條化尤顯強烈，時有悲劇穿插其間。

我們檢視中共政權四十年來的文化景況，如不欲與意識形態、黨政、經濟、外交、軍事、法制、社會、教育、統戰等層面重疊，則其範圍宜更精確。本文首以中共的文化部爲參考基點，說明其組織與運作方式，繼之觀察中共領袖的有關舉措，以及大陸文化界的反彈，最後評估未來的演展。未來誠難逆料，但鑑往仍有收穫，因爲歷史即或不重演，有時卻雷同再現。中共政權四十年來的紀錄，尤可證實此說。

二、文化部的組織與運作

一九四九年六月，共軍節節勝利，毛澤東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的籌備會上宣稱，聯合政府一經成立，將盡一切可能，用極大力量，「從事人民經濟事業的恢復和發展，同時恢復和發展人民的文化教育事業」^③。隨後，他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強調中共的武器是馬列主義，中國要在共產黨領導下，團結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中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結成統一戰線

，以工農聯盟為基礎，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④。兩相對照，「人民的文化事業」與馬列主義密不可分，自不待言。其實，早在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澤東即已明定，中共的文藝政策包括了學習馬列主義，同時要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共產黨員更要站在黨的立場，對敵人暴露和打擊，對同盟者既聯合又批評，對自己人則歌頌和讚揚。換言之，文藝是整個革命機器的一部分，是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武器。本此原則，中共推廣其文化事業。

一九四九年九月廿一日至三十日，第一屆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北平召開，會中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並通過共同綱領，內設「文化教育政策」專章，鼓吹新民主主義，提倡文藝為人民服務，啓發人民的政治覺悟等^⑤。政協會議同時通過人民政府組織法，政務院設文化教育委員會，指導文化部、教育部、衛生部、中國科學院、新聞總署和出版總署的工作。此處所謂新民主主義，乃毛澤東於一九四〇年所倡，即「幾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頗收統戰之效。中共「建國」伊始，為應付各民主黨派，仍維持此門面語，後來則棄如敝屣。至於政務院，一九五四年起改稱國務院。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日，文化部正式成立，首任部長沈雁冰，即作家茅盾。副部長有二，一為周揚，一為丁燮林。文化部下設：①藝術局，局長周揚；②科學普及局，局長袁翰青；③文物局，局長鄭振鐸；④電影局，局長袁

牧之；⑤戲曲改良局，局長田漢；⑥對外事物聯絡局，局長蕭三；⑦中央戲劇學院，院長歐陽予倩；⑧中央音樂學院，院長馬思聰；⑨中央美術學院，院長徐悲鴻；⑩中央文學研究所，所長丁玲。上述諸人後來不乏遭劫於文化大革命者，正可說明文化人的悲哀。

此時與文化部同受文化教育委員會督導的機構，如中國科學院，院長為郭沫若，副院長五人：陳伯達、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楨、吳有訓，下設十五個研究所，以及計畫局、聯絡局、編譯局、天文台、實驗室、中國地質工作計畫指導委員會等。新聞總署署長為胡喬木，副署長有二，一為范長江，一為薩空了，下設新華通訊社（社長陳克寒）、廣播事業局（局長李強）、國際新聞局（局長喬冠華）、新聞攝影局（局長薩空了）、北京新聞學校（校長范長江）等。出版總署署長為胡愈之，副署長有二，一為葉聖陶，一為周建人，下設編審局（局長葉聖陶）、翻譯局（局長沈志遠）、出版局（局長黃洛峯）等。發號司令的文化教育委員會本身，主任則為郭沫若，副主任四人：馬敘倫、陳伯達、陸定一、沈雁冰，委員四十七人，另設秘書長、副秘書長、計畫委員會、宗教事務處等。由以上編制，可知中共對文化宣傳分工之細，用心之深。

中共素重文宣，尤以深入民間為能事。上述中央機構成立後，中共明定人民政府直轄區（即華北區）的文教工作歸政務院，華東、西北、中南、西南、東北五大行政區，則分別在

軍政委員會或各該區人民政府下，設置文教委員會，其下並得設文教、衛生、新聞、出版等部、局或處。內蒙古自治區的人民政府設文化教育、新聞、出版等廳處，市設文教局，縣設文教、新聞、出版等廳處，市設文教局，縣設教育局，區設文教股，鄉設文教幹事^⑥。如此從中央到地方，配以各式媒體，鼓吹羣衆運動，果能收效一時。

一九五四年九月，人民代表大會以政協的共同綱領為基礎，通過中共第一部憲法，改政務院為國務院，文化部的組織也有所調整，部長仍為沈雁冰，副部長則增至六人：錢俊瑞、丁西林、鄭振鐸、夏衍、陳克寒、張致祥。下設：1.辦公廳；2.人事司；3.財務司；4.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局長鄭振鐸；5.出版事業管理局，局長黃洛峯；6.藝術事業管理局，局長田漢；7.電影事業管理局，局長王蘭西；8.中央戲曲研究所，所長梅蘭芳；9.中央戲劇學院，院長歐陽予倩；10.中央音樂學院，院長馬思聰；11.中央美術學院，副院長吳作人；12.中央文學研究所，所長丁玲；13.電影學院，院長王蘭西。

國務院除文化部外，尚有若干相關的直屬單位：(一)新華通訊社，社長吳冷西；(二)廣播事業管理局，局長梅益；(三)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主任吳玉章，四對外文化聯絡局，局長蕭三；(四)宗教事務局，局長何成湘；(五)體育運動委員會；主任賀龍。新聞總署撤銷後，上述新華

社和廣播局獲得名義上的獨立。出版總署撤銷後，業務則併入文化部，後者職權益見擴大。

一九六五年文化部改組，陸定一繼任部長，顯示中共中央宣傳部的直接干預。中共向來以黨領政，文化部內有黨團，上有國務院文教科辦公室（過去是文化教育委員會），再上還有中央宣傳部，當時的部長正是陸定一。然而，毛澤東在次年即發動文化大革命，陸定一成為牛鬼蛇神，文化部的業務停擺。一九七二年初，國務院另外出現文化組，組長是北京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吳德，其權力之大，已超越文化部長。

文革結束後的一九八二年五月，文化部長由中宣部副部長朱穆之接任。前此，蕭望東與黃鎮也出長過該部。原屬國務院的四個單位，此時也併入文化部：（一）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主任黃鎮），（二）國家出版事業管理局（局長王匡），（三）國家文物事業管理局（局長孫軼青），（四）外交出版事業發行局（局長吳文燾）。一九八六年四月，作家王蒙接任部長。

文藝在大陸向來屬於敏感領域，主管文藝工作的文化部因此有「政治寒暑表」之稱，歷任部長中僅茅盾是作家出身，近年又開一例。王蒙從五十年代因作品觸怒當局而遭下放，到八十年代躋身中共的官僚階層，得力於他在八九二年五月赴美出席當代中國文學會議的表現，該年十月三日，人民日報發表其追憶文字：「雨中的野葡萄園島」，展示了共產黨員的心態：「這次來美國是為了參加紐約聖若望大

學的一次國際性的關於中國當代文學的討論。當然，有許多嚴肅的、態度客觀的學者參加了討論，但也確實有幾個人利用文學討論兜售他們的一廂情願的反共反華濫調。叫人高興的是這些人的挑畔都遭到了應有的有理有據的反擊，到後來，出醜的，恰恰是這些人自己⑦。」這種冗長拙劣的文字，不像出自名家之手，但確保了王蒙的平步青雲。或亦可說，這是他對中共寵愛及於其身的答禮，因為就在前一個月，他成為中央候補委員。至一九八五年九月，更升為中央委員。

稍早的一九八三年十月，鄧小平在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上，提出思想和文化戰線清除精神污染的問題，正式揭開對理論界、文藝界的全面整肅，這是鄧小平師法毛澤東，親自主持的一次新整風。王蒙此時積極表態，再度以今日之左否定昨日之右，強調要以毛澤東的舊文「反對自由主義」為武器，反對右傾和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思潮。依王蒙之見，西方資產階級的影響所及，有的表現為腐朽沒落的生活方式，有的則是露骨或稍加打扮的反共主義。「有時候這種醜惡的反共論調，竟能在某種幌子下在一些翻譯出版物中滲透進來，實在令人觸目驚心。我們還應該指出，甚至在一些中性的或較好的西方學術、文藝作品中，也難以完全擺脫它們的產地的根深蒂固的反共偏見的影響。」⑧。以上這種冗長拙劣的文字，他每在重要時刻照搬，顯示了官方文學家的身分。

王蒙深感憂慮的是，文藝創作上問題也不

少。「如有的胡編亂造，歪曲革命歷史與革命事實，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有的作品甚至發展到美化國民黨，美化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否定階級及階級鬥爭，否定革命、革命戰爭的正義性、必然性與必要性，提倡超階級、超黨派、非革命的『人性復歸』，實際上是拾起了歷史唯心主義的濫調，拾起了用資產階級人性論反對馬克思主義階級論的陳詞濫調⑨」。王蒙對唯心主義的批評，令人想起他自己在一九八一年所獲的類似罪名，但時隔兩年，他已扮演文藝指揮家的角色，不復當年的窘狀了。「有的作品甚至發展到美化國民黨」，王蒙說出中共最畏懼的實情。部分大陸作家與中共之間，已由內部矛盾提昇為敵我矛盾，在中共看來，這無異是「反革命」。王蒙也承認，確實有人至今不喜歡四項基本原則，他心所謂危，因此強調堅持之必要，這是官僚主義的聲音。正因如此，他當上了文化部長。

一九八九年九月四日，中共人代常委會通過國務院總理李鵬的提議，任命賀敬之為文化部代理部長，王蒙則「准予辭職」。賀敬之原任中宣部副部長，曾經編寫「白毛女」，強調階級仇恨，並在一九八三年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中，一九八七年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清算其他作家。王蒙原受胡耀邦與趙紫陽提拔，胡耀邦死亡在先，趙紫陽失勢在後，王蒙的下台並非意外。賀敬之的背後有鄧力羣，鄧力羣原任中宣部長，打擊作家不遺餘力，大陸文壇的收風更緊了。前已提及，文化部在運作時

受制於中宣部，依中共的目光，文化即宣傳，宣傳即文化，二者密不可分。文藝工作者若不甘就範，則必須承受絕大的壓力，四十年的血淚斑斑可考，猶在世人眼前。

三、毛澤東時代的壓力與反彈

一九四九年七月，中共召開第一次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以郭沫若為總主席，茅盾和周揚為副總主席。八百二十四名代表聆聽了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的訓示，後者強調文藝工作者要表現新時代，就必須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貫徹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與會者也紛紛表態，謂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雖已發表七年，仍然完全正確和適用，是今後文藝工作者實踐的指標^⑩。大會在向毛澤東致敬後閉幕，宣言中重申其文藝方針的卓越，並矢志繼續遵辦。中共不以延安時期清算王實味等作家為滿足，並認定毛澤東文藝政策有助於大陸的赤化。這種成果驗收，加重了對作家的控制，也反彈到中共自身。

一九五一年五月，中共發動成立政權後的首次文藝整風，此因電影「武訓傳」和其他若干「非正統」的事件所引起，許多作家被迫自我批評和公開悔過。首先，批判「武訓傳」原是一個文藝問題，但運動並不著眼於文藝，卻規定要和資產階級思想對抗，強調是一場政治鬥爭。其次，強化了文學主題的單一性，使得本已因歌頌工農兵而排斥其他題材的作風，至此又見助長。再次，文藝從屬於政治的關係更

加凝固，毛澤東此項並不科學的原則，就在疆場一片勝利的霞光中，被映襯得更加輝煌神聖，其權威不可移易^⑪。延安文藝講話的肆虐，因中共統治區域的擴大，更顯現其殺傷力，此後的文藝整風，一波勝過一波，至文化大革命達到最高潮。

一九五四年十月的第二次整風，起自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事件，引發全面的批評胡適思想，並對主持文藝報的馮雪峰，提出工作錯誤的檢查與鬥爭。此與三年前對「武訓傳」的批判相同，歷史背景和政治意圖一脈相承，也都是毛澤東親自發動的，他在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中指出：「看樣子，這個反對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三十餘年的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鬥爭，也許可以展開起來了。事情是兩個『小人物』做起來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並往往加以阻攔，他們同資產階級作家在唯心論方面講統一戰線，甘心作資產階級的俘虜，這同影片『清宮秘史』和『武訓傳』放映時候的情形幾乎是相同的^⑫。」毛澤東心所謂危，趁此一償他在「新民主主義論」中的宿願，即思總結中國新文化運動。由於胡適在五卅時期的地位遠勝於毛澤東，影響亦頗深遠，毛澤東單單基於補償心理，也不免要為刷新歷史而努力了。

這次整風一直延續到正式批鬥胡風開始，才告一段落，可謂問不容髮，中共的文網之密，也由此可見。胡風在政治立場上原與中共一致，周揚一度稱之為「沒有入黨的布爾希維克

」，其與中共的分裂，始與抗戰時期對毛澤東文藝政策的堅拒。一九四九年以後，他屢遭周揚、林默涵、何其芳的攻擊，由於不甘示弱，乃利用文藝幹部因紅樓夢研究事件被毛澤東譴責的機會，向中共中央告御狀。一九五四年七月，他呈上合計三十萬字的意見書，除為自己 and 朋輩伸冤外，還盼中共重新檢討文藝政策，撤換文藝官僚。意見書指出在宗派主義的地盤上，讀者和作家頭上被放下了五把刀子：(一)作家要從事創作實踐，首先非得具有完美無缺的共產主義世界觀不可。(二)只有工農兵的生活才算生活，日常生活不是生活。(三)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創作。(四)只有過去的形式才算民族形式。(五)題材有重要與否之分，能決定作品的價值，這就使得作家變成唯物論的被動機器。凡此控訴，表面針對林默涵等，矛頭實指向毛澤東的延安文藝講話，致觸後者的大怒。

一九五五年一月，毛澤東親自出馬，公開胡風的意見書，並且展開批鬥。稍後，胡風及其友人都遭同時抄家，檔案資料也被調到北平，毛澤東據此寫按語，分於五月十三日、廿四日和六月十日，在人民日報公布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過去說是『小集團』，不對了，他們的人很多。過去說是一批單純的文化人，不對了，他們的人鑽進了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教育各個部門裏。過去說他們好像是一批明火執仗的革命黨，不對了，他們的人大都是有嚴重問題的。他們的基本隊伍，或是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特務，或是托洛茨基

分子，或是反動軍官，或是共產黨的叛徒，由這些人做骨幹組成了一個暗藏在革命陣營裏的反革命派別，一個地下的獨立王國^⑬。」毛澤東這段御批，使得胡風的苦難日益逼近。

在搜出的「反革命」材料中，最令毛澤東感到難堪的，是一九五一年八月廿二日張中曉致胡風的信，其中批判了延安文藝講話：「這書，也許在延安時有用，現在，我覺得是不行了，照現在的行情，它能屠殺生靈，怪不得幫閒們奉若圖騰！」毛澤東懷恨之餘，便大量製造輿論，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三日到七月九日，人民日報就收到要求嚴懲胡風的讀者來信一萬一千八百封。此時「文聯」和「作協」都落井下石，在聯席擴大會議上通過五項決議：（一）根據「作協」章程第四條，開除胡風的會籍，並撤銷其理事和「人民文學」的編委職務。（二）撤銷胡風所任「文聯」委員之職。（三）向「人代常委會」建議，撤銷胡風的代表資格。（四）向「最高人民檢察院」建議，對胡風反革命罪行進行必要的處理。（五）警告「作協」、「文聯」其他協會中的胡風分子，必須站出來揭露胡風，批判自己^⑭。七月五日，人代表第二次會議在北平開幕，七月十六日，兩名代表——胡風和潘漢年即同時被捕。此後，中共在大陸全面展開「堅決徹底粉碎胡風反革命集團」、「肅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運動，成為文革前株連最廣、影響最大的文藝整風。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八日的人民日報社論透露，胡風被捕後的肅反運動中，清查出八萬一千多名「反革命分子」

，一百三十多萬人交代了各種政治問題。由此再度證明，中共文藝整風的目的，不是文學的，而是政治的。

正因受侮辱與受損害的知識分子過多，不利於中共的聲譽，毛澤東乃於一九五六年五月，提出旨在安撫的「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口號。一九五七年二月，他重彈此調，以求「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五月一日，中共正式公布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要大家以鳴放幫助共產黨反官僚、反宗派和反主觀主義。中共強調「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極盡廣開言路的表態，於是五、六月間，大陸各民主黨派、工商人士、教授作家、青年學生，乃至共產黨員爭取民主的運動，就以星火燎原之姿展開，其勢如排山倒海，毛澤東形容為「一時天暗地黑，日月無光」，他在驚恐之餘，開始變臉反撲。六月上旬起，中共即進行反右派鬥爭。七月一日，毛澤東親撰的人民日報社論中有如下名句：「有人說，這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因為事先告訴了敵人：牛鬼蛇神只有讓他們出籠，才好殲滅它們；毒草只有讓它們出土，才便於鋤掉^⑮。」這裏所謂陽謀，只是事後孔明。毛澤東鼓勵鳴放的本意，在使知識分子——包括作家為其所用，不料抗聲遍傳，指向中共無可救藥的弱點，毛澤東深感作法自斃的難堪，只有食言而肥，以陽謀自壯了。

據中共自己估計，右派人數多達六百萬之譜，力量不容忽視。就文藝界而言，劉賓雁的「在橋樑工地上」、「本報內部消息」，王蒙

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等作品皆遭批判；何直（秦兆陽）的「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錢谷融的「論『文學是人學』」，巴人（王任叔）的「論人情」，劉紹棠的「我對當前文藝問題的一些淺見」等論文，全被視為修正主義文藝思想而大加撻伐；丁玲、馮雪峯、艾青等多名作家，同被劃為右派分子^⑯。「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的罪名，包括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世界觀，以及修正主義的文藝思想，結果彼等遭剝奪職業與黨籍，並下放勞改。「左聯」解散後兩個口號論爭時支持魯迅的黃源，此時亦遭整肅。令人感到周揚無情的，是其親密戰友徐懋庸也不能倖免。周揚藉此把徐懋庸過去寫信罵魯迅一事，說成徐的個人錯誤，與己無涉；另則使徐在文藝界除名，以免後患^⑰。這是一種滅口之舉，而毛澤東聽之由之。

一九六三年間，毛澤東對當時大陸的文化產品已感不悅，認為文藝領導機構和文藝工作者，其實都轉向資本主義和修正主義，致使社會主義改造收效甚微，因此他咄咄稱怪^⑱。一九六四年六月，毛澤東按捺不住，直斥彼等不執行政策，跌到修正主義的邊緣。周揚由此心生警惕，便進行一次整風，批判了密友邵荃麟、夏衍和田漢，茅盾也受累而遭處分，但其本人終於難逃劫數。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一日，姚文元在上海文匯報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揭開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一九六六年二月，江青在上海主持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事後寫了一

份紀要，經毛澤東三次親自審閱和修改才定稿^{①9}，頗能反映毛澤東此時的文藝觀。紀要指出，大陸文藝界從一九四九年以來，被一條與毛澤東思想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黑線專了政，它是資產階級、現代修正主義的文藝思想和三十年代文藝的整合。「我們一定要根據黨中央的指示，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徹底搞掉這條黑線。搞掉這條黑線以後，還會有將來的黑線，還得再鬥爭。所以，這是一場艱鉅、複雜、長期的鬥爭，要經過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的努力^{②0}」。毛澤東和江青如此說，也如此做，但不得善終。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八日，解放軍報發表社論，正式號召實施文化大革命，其中論及三十年代的國防文學口號，認為是「那時左翼的某些領導人在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的影響之下，背離馬克思列寧的階級觀點」，此說不啻公開否定了周揚。七月十七日，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同時刊出「駁周揚的修正主義文藝綱領」，指周揚集團在三十年代提倡國防文學，打擊無產階級左翼文藝運動的偉大旗手魯迅，並和毛澤東的延安文藝講話演對台戲。七月廿九日，光明日報報導中共中央宣傳部舉行會議，「徹底打倒文藝界的活閻王，聲討周揚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滔天罪行」。稍早，七月一日出版的紅旗雜誌亦已正面攻擊周揚，並揭發後者於一九五七年利用批判馮雪峯和徐懋庸的機會，為「魯迅全集」第六卷加一註解，是替自己開脫。周揚終在該年被撤職逮捕，

夏衍、田漢及陽翰笙，當年與他合被魯迅諷為「四條漢子」，也同遭公審鬥爭，其中夏衍以改編矛盾的「林家鋪子」搬上銀幕獲罪，田漢以歷史劇「謝瑤環」賈禍，陽翰笙以編導「北國江南」電影被整，當然這些都只是導火線。此後十年，千千萬萬個文藝工作者飽受摧殘，成為毛澤東政策下的集體犧牲品。

因文化大革命而死的大陸文藝工作者，至少包括：(一)作家：老舍、田漢、阿英、趙樹理、柳青、周立波、何其芳、鄭伯奇、楊朔、郭小川、聞捷、蘆芒、蔣牧良、李廣田、劉澍德、孟超、陳翔鶴、納、賽音朝客圖、馬健翎、魏金枝、司馬文森、羅廣斌、海默、韓北屏、黃谷柳、遠千里、方之、蕭也牧、鄧拓、范長江。(二)文藝評論家：馮雪峯、邵荃麟、王任叔、劉芝明、何家槐、葉以羣、侯金鏡、陳笑雨、徐懋庸。(三)文學翻譯家：董秋斯、傅雷、滿濤、麗尼。(四)平劇演員：周信芳(麒麟童)、蓋叫天、荀慧生、馬連良、尚小雲、言慧珠、李少春、葉盛蘭、葉盛章、韓俊卿、竺水娟。(五)話劇家：章泯、焦菊隱、孫維世、舒繡文。(六)演員：蔡楚生、鄭君里、袁牧之、田方、崔嵬、上官雲珠、應雲衛、孟君謀、徐滔、顧而已、魏鶴齡、楊小鐘、劉國全、羅靜予、孫師毅。(七)地方戲演員：張德成、李再雯、嚴鳳英、蘇育民、顧月珍、筱愛琴。(八)音樂家：馬可、鄭成、黎國荃、顧聖嬰、向隅、蔡紹序、陸洪恩。(九)美術家：潘天壽、王司廓、董希文、豐子愷、陳半丁、秦仲文、陳煙橋、馬達、倪

貽德、蕭傳玖。(十)民歌手：毛一罕、琶杰、王老九、霍滿生。(十一)攝影家：鄭景康。(十二)曲藝家：王尊三、王少堂。(十三)木偶藝術家：楊勝。

死於文化大革命的其他文化工作者，還有教育界的翦伯贊、吳晗、金仲華、王亞南、楊獻珍、李達、陳寅恪、劉仙洲、梁思成、張子高、崔宏、彭康、吳玉章、孫泱。科技學術界的趙九章、熊慶來、葉渚沛、劉崇樂、張宗燧、鄧淑羣、諸葛文屏、黃武漢、傅達錚、謝天華等^{②1}。十年浩劫造成千萬人頭落地，億萬人心受戕，知識分子則首當其衝，名列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叛徒、特務、走資派之後，淪為「臭老九」，飽受貶抑。知識分子中的作家，因被史達林以降的中外共產黨領袖視為「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先須改造自己的靈魂，因此受害最深。

至於周揚等人遭到清算，自與三十年代文藝的歷史評價有關。大陸文藝界確有不少人抵觸毛澤東的文藝思想，不願深入工農兵的階級鬥爭生活，不願配合共產黨的中心運動描寫欽定對象，念念不忘的是三十年代文藝，甚至公開表示繼承，不以四十年代延安的工農兵文藝為正統。在此情景下，毛澤東必然採取行動。由於周揚是三十年代左翼文運的主要幹部，對此段歷史當然肯定，而他向來又是文藝部門的負責人，影響力也較廣，因此要動搖周揚等三十年代人物的地位，以改變該時代予人的權威印象。換言之，周揚的難逃劫數，說明毛澤東嫌他執行命令還不夠徹底，故由江青、張春橋

、姚文元等取代。文化大革命的動機，除了牽涉中共的權力鬥爭外，就是要摧毀所有與毛澤東思想不符的思想，江青等執行的文藝路線，在毛澤東心目中，自屬最為正確。

中國共產主義原由蘇聯輸入，兩共分裂後，毛澤東變本加厲，強化對史達林和他本人的崇拜，而以馬列主義的正統自居，對其他文化思想都懷懼恨，視為毒草。由此可知，清算三十年代文藝勢所難免，一九四九年以後大陸作家的悲運，也早在毛澤東發表延安文藝講話時即已初定。中共曾經指出，與毛澤東文藝思想對立的論點，有寫真實論、現實主義廣潤道路論、現實主義深化論、反題材決定論、中間人物論、時代精神滙合論、離經叛道論、反火藥味論、全民文藝論、創作自由論等，還有陽翰笙的「十條繩子」論^②，可與胡風提到的「五把刀子」並觀，都是對延安文藝講話造成作家顧慮重、下筆難，作品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抗議，毛澤東的四面皆敵，也由此可見。

一九四九年以後的大陸文壇，胡風形容為殭屍所統治，每咳一聲都有人來錄音檢查。「但我在磨我的劍，窺測方向，到我看準了的時候，我願意割下我的頭顱拋擲出去，把那個髒臭的鐵壁擊碎的。」^③胡風因此換來二十四年的牢獄之災，終以精神病兼腦動脈硬化症辭世，但此一悲劇並未使得大陸所有作家啞啞無聲。他們為爭自由，為伸正義，寧鳴而死，不默而生，毛澤東時代如此，鄧小平時代亦然。
(未完，下期待續)

註 釋

- ①：引自陳奇祿：「民族與文化」，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民國七十年十二月初版，二〇頁。
- ②：「社會主義文化」，收入夏征農主編：「社會主義辭典」，吉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一月第一版，三四二頁。
- ③：毛澤東：「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上的講話」(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收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〇年九月北京第一版，一九六四年九月北京第五次印刷，一四七〇頁。
- ④：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紀念中國共產黨二十八週年)(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收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同註③，一四七七頁。
- ⑤：「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一九四九年九月廿九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收入「人民手冊」，一九五〇，上海大公報，一九五〇年元旦初版，二九頁。
- ⑥：李由農：「共匪文化與宣傳」，台北陽明山莊印，民國四十年十月，二一頁。
- ⑦：王蒙：「雨中的野葡萄園島」，人民日報，一九八二年十月三日。
- ⑧：王蒙：「滌除污垢，迎接新的繁榮」，光明日報，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七日。
- ⑨ 同註⑧。
- ⑩：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下冊)，上海文藝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修訂重版，一九八二年十一月第一次印刷，六〇五頁。
- ⑪：朱寨主編：「中國當代文學思潮史」，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五月北京第一版，八二頁。
- ⑫：毛澤東：「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七年四月第一版，一九七七年四月北京第一次印刷，一三五頁。
- ⑬：毛澤東：「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語」，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同註⑫，一六三頁。
- ⑭：翟志成：「中共文藝政策研究論文集」，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民國七十二年六月初版，一三七頁。
- ⑮：毛澤東：「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同註⑫，四三五頁。
- ⑯：二十二院校編寫組：「中國當代文學史」(二)，福建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十二月第一版，一九八一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三一頁。
- ⑰：丁友光：「周揚與『國防文學』問題」，香港明報月刊，第八期，一九六六年八月。
- ⑱：毛澤東：「關於文藝工作的批示」(一九六三/一九六四)，收入「毛澤東思想萬

歲」第三輯，台北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複製，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六頁。

①9：「林彪同志給中共軍委常委的信」，收入「江青同志論文藝」，一九六八年五月出版，台北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複製，一九七四年七月，三頁。

②0：「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收入「江青同志論文藝」，同註①9，七頁。

②1：「中共怎樣對待知識分子原始資料彙編之

一」(下)，台北黎明文化公司，民國七十二年六月初版，三六三頁。

②2：一九六二年三月，陽翰笙在廣州召開的話劇、新歌劇、兒童劇創作會議上，指中共對文藝工作的領導，是用十條繩子捆住了作家的手足，造成了五個「一定」和五個「不致」：(1)一定要寫重大題材。(2)一定要寫英雄人物、尖端人物。(3)一定要參加集體創作。(4)一定要限期完成。(5)一定要得到領導批准。(6)不敢寫人民內部矛盾，

特別是領導與被領導的矛盾。(7)不敢寫諷刺劇。(8)不敢寫悲劇。(9)不敢寫英雄人物的缺點、失敗。(10)不敢寫黨員的缺點、領導的缺點。見「增訂中共術語彙解」，台北中國出版公司，民國六十年三月初版，六十六年二月增訂三版，六二頁。

②3：「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第二批資料」，人民日報，一九五五年五月廿四日。

(人文及社會科學文庫)

郭沫若總論

金達凱著

二四三元

——三十年代中共文化活動的縮影

本書共六章，約三十五萬言。作者運用數百種各項原始資料，全面系統的論述郭沫若的一生，對郭之人格、學格、文藝思想、作品及學術上引起爭論的問題，均作詳盡分析。

人文及社會科學文庫

一九二〇年代初期中國社會主義論戰

蔡國裕著 二五二元

本書探討對中國社會性質、社會問題及其解決方法各有不同論點之社會主義論戰的來龍去脈、爭論內容，及其對中國現代思想及政治發展所產生之深遠影響。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卅七號
郵撥〇〇〇〇一六五一號
電話：三一—一五三八